

“用飞机在敌人上空飞行，撒下蒙汗药，使敌人全部昏睡不醒，我们不用开枪打炮，只是去捉俘虏就行了。这岂不是战争的一场大革命吗？”

孙中山创办航校赴鲁讨袁

□ 刘玉华

“用飞机在敌人上空飞行，撒下蒙汗药，使敌人全部昏睡不醒，我们不用开枪打炮，只是去捉俘虏就行了。这岂不是战争的一场大革命吗？”1916年2月6日，孙中山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将日本著名的民间飞行家坂本寿一介绍给他，两人用英语交谈得十分投机。兴奋之余，为人严谨的孙中山诙谐地说了这番话。

七年之前，孙中山对飞机的作用和意义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当他听说，中国第一架飞机诞生于广东青年冯如之手时，遍游欧美各国宣传革命的孙中山预言：“飞机将成为新式的军事武器，大大有助于实现我国国民革命。”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于1913年创建南苑航空学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远在日本，一直筹划和指挥国内讨袁事业的孙中山，在梅屋庄吉的资助下创办了革命军的首所航空学校——中华革命党近江八日市飞行学校。学校于1916年5月4日正式开学，校址位于京都附近的近江八日市町，第一批学员47人。

革命军航校迁回国内助战

40多名学员在日本进行紧张训练的同时，孙中山派居正在青岛组建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已经赶赴胶济铁路中段地区，攻城略地，战火如荼。“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从这年开始，革命党人相继在上海、广州、江苏、安徽、陕西、湖北、福建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反袁，但多数举义成功后又失败，有的甚至起义未成即被镇压。

1915年夏末，孙中山召集廖仲恺等接连举行十多次会议进行研究，决定汲取教训，统一领导，在全国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在四个军中，孙中山最看重的是东北军。孙中山在日期间，一直要求日本政府支持中国革命，但均遭拒绝。袁世凯称帝之日，日政府对华政策难以掌控，弃之又有不甘，便暗中支持袁力量，以期日后与“新政府”密交。当时胶济线为日军所侵占，东北军可藉此之便，从青岛进攻潍县，以潍县为大本营，收复鲁中、鲁东，进而攻占济南，直取北京。

1915年11月15日，居正率部到达青岛，在原德国驻青岛总督官邸设立东北军总司令部，进行起义筹备。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呼吁各方力量“戮此民贼，以拯吾民”。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1916年5月，中华革命军东北军2000多人，从青岛进至胶济铁路中段的潍县、周村等地，拉开武装讨袁的大幕。

1916年5月4日，东北军首先攻潍县城不克，居正一面布兵围城，一面分兵向四周出击。到5月中旬，益都、安丘、昌邑、寿光、高密、诸城、昌乐、临朐、周村等均被东北军占领，潍县城仍然两军对峙。5月15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派遣五六百人的袭击队潜入济南，偷袭山东督军府，伤亡数十人，失败后退出。5月20日，居正让东北军顾问董野长致电梅屋庄吉陈述战情，询问：“将飞机立即送往此地(指潍县)就地训练如何？”

梅屋庄吉随即电告坂本寿一：“飞行学校将迁至中国，速来京商议。”坂本寿一接电后，立即乘火车赶到东京。在梅屋庄吉住处，坂本寿一看电报，面露难色。他告诉梅屋庄吉，机场的各种设施刚建成，开始训练才半个多月。如果这时将飞机迁往中国，不但要中断训练，而且还要重新修建机场及各种设施。梅屋庄吉也对航校中断训

清末民国年间，高唐县有四人先后考入北大和清华，按先后顺序分别是田士懿、张静愚、王国耀、张守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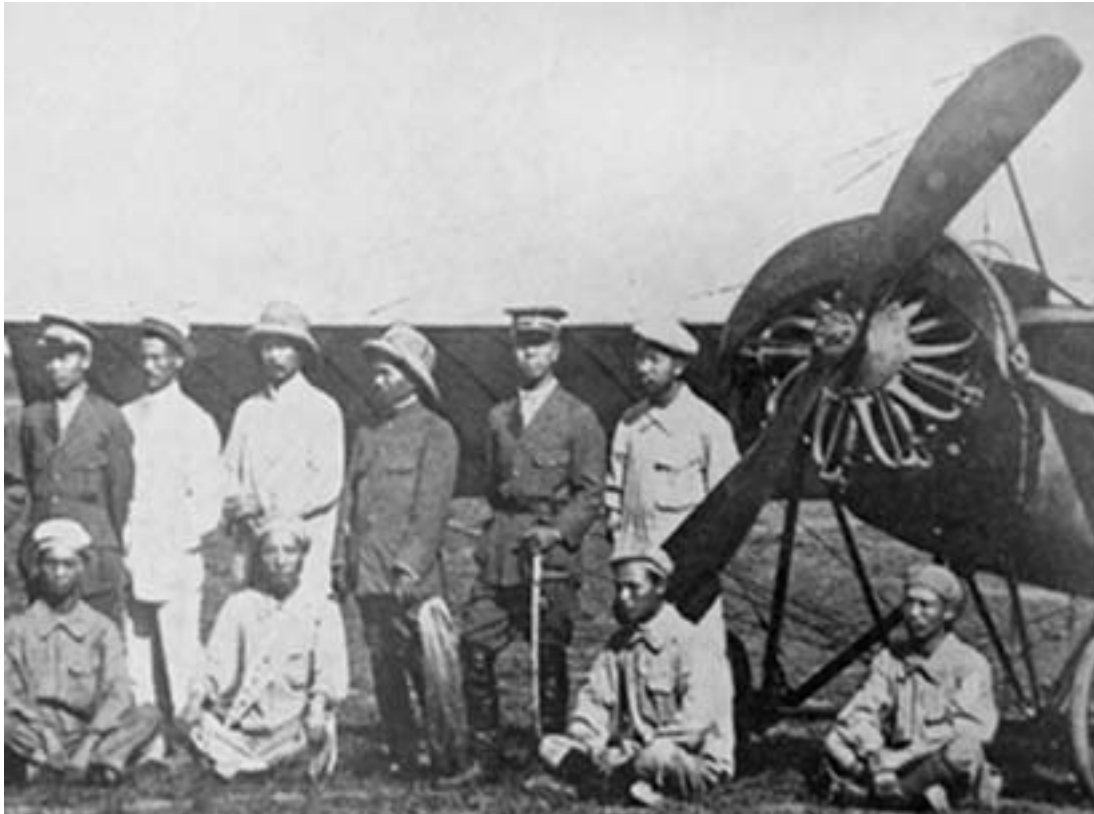
性癖金石的田士懿

第一位考入北京大学(前身叫京师大学堂)的是今尹集镇田寨村的田士懿(字德忱，号雅庵)。田士懿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逝世于1929年。他生于一个中道败落的耕读人家。1903年考中举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他考入中国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成为这所大学第一位高唐籍学生。在这里，鸿儒巨擘的教诲、民主氛围的熏陶给了他良好的教益和启迪。辛亥革命在国内兴起时，他历任山东巨野、宁阳和湖南嘉禾、湘潭县知事。他一身正气，政声卓著，如事湘潭更是大气凛然。1920年，一只日本舰船由于正同英国争夺长江流域势力范围，有一天竟然驶进湘潭码头，听闻此消息率属下愤然前往，严词痛斥，不准登岸入市。日船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去。消息传开，无不翘指称颂。

田的义举令军阀不悦，于是他辞职投笔，北归京都，后回到家乡从事金石书画研究。国学大师王献唐先生称赞他，“性癖金石，几成陈腐”，“兼善书画”，“伏案钩稽，孜孜不倦”。他的多种著作被收藏在省图书馆古典文献特藏部，如《山左汉魏六朝贞石目》(木版)、《金石著述名家考略》(木版)、《增广金石著述目》、《字画从钞》等。

痴心教育的张静愚

第一位考入清华的是今鱼丘湖街道南街村人张静愚。1903年张静愚入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1910年考入省立济南农业学堂，后考取清华留学预备学堂，其间以头等翻译的身份赴欧参加



华侨义勇团飞行队在潍县飞机场

练、仓促迁移感到惋惜，但中国战事紧迫，亟需飞机队助战，遂说服坂本寿一马上迁校。坂本寿一回校后，立即开始了迁校的各项准备。

5月25日，东北军进驻潍县城。但是济南攻不下，由此直捣北京、推翻袁世凯政府的目的难以实现。已从日本返回上海指挥讨袁的孙中山十分焦虑。6月7日，他向居正发去电报：“飞行家尾崎同廖国仁、谢松生赴潍，与兄商飞行事。”

6月6日，袁世凯病危，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马上电告居正“按兵勿动”、“飞行上事应停办”。此后是孙中山改变了决定，还是梅屋庄吉没有与回国的孙中山沟通，目前尚未发现资料佐证。事实却是，飞行学校全体学员按原计划从神戸乘船启程，7月2日抵青岛转乘列车，7月4日到达潍县。

乡民见之，惊为天仙

中华革命党近江八日市飞行学校迁到潍县后，更名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飞机队”，隶属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

华侨义勇团飞机队长由骑兵队长吴光梅兼任，管理主任胡汉贤，副官马超俊，助理员兼通译刘季谋，总务李敏，军需马少汉，会计兼出纳马栋廷，书记兼飞行记录员韩毓，飞行员30多人。教官为坂本寿一、星野米藏和立花了观等。机场修好后，学员们继续进行训练。

8月初，坂本寿一驾机试飞。被孙中山派来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8月4日，晴。代理总司令(许崇智)派介石至西操场观操，飞行机试验滑走。”“8月7日，朝六时半，代理总司令往西操场观坂本氏之飞行，飞行高约800米，飞行时间约15分钟之久。”华侨义勇团团长夏重民记道：“乡民见之，惊为天仙。”

最初飞行教练机只有2架，是原飞行学校所用，拆解后由日本带来重新组装而成。7月底，

孙中山派在美国负责革命军筹饷和党务活动的林森购进一架，由尾崎行辉带来。坂本寿一与尾崎行辉一直不合，尾崎行辉带飞机到达后，欲另组一队。与坂本寿一交好的星野米藏闻知后大为不悦，夏重民致电孙中山汇报此事。经过调和，尾崎行辉将飞机交到飞机队。

最后，飞机队组成三队，第一队由胡汉贤率领，第二队由刘季谋率领，第三队由李敏率领，每队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每日除有飞行任务外，仍按照八日市飞行学校课程训练。

华侨义勇团飞机队，是齐鲁大地乃至华东地区最早的中国航空队。华侨义勇团飞机队组建前，山东仅有德军、日军的飞行队出现过。

自行建设机场

飞机运抵潍县，首要的任务是建飞机场。这座山东境内乃至华东地区由中国自行建设的第一座机场究竟在潍县何处？

1994年1月，潍坊两位70多岁的文史研究者刘秉信和张温光寻踪查访时，距机场建成已经78年。两人冒着严寒，利用春节前后的时间，寻访了10多位9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摸清了飞机场的大体方位：原潍坊拖拉机厂西厂区西侧、胶济铁路以北的塔子坡一带。这里是旧潍县城的西郊。之后，他们又找到后来在此地建厂施工的当事人佐证，最终确定此址。

在被访者记忆中，当地不少老百姓参加了机场修建。机场极为简陋，地面是用碌碡反复碾压而成，机库开始是草棚，后来又建了砖瓦房。那时的飞机速度很慢，机身也轻，起飞、着陆滑行距离短，对跑道质量要求不是很高。

1916年7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飞行场现设于北门外，大约飞机试飞行期不出此句”。飞机有单翼、双翼两种，双翼的“有三十四匹马力，航空十小时，每小时能飞行二百英里，载重一顿零，最高度可升至六千余

米……如遇顺风者，自潍至北京不到二时，即得达矣。”解密后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往西操场观坂本氏之飞行”等语，印证了刘秉信和张温光的调查。由此可见，《民国日报》报道有误，机场应在潍县城西门外。

参加空袭战

“为了瓦解敌军军心，于5月10日由飞机队派出全部三架飞机，飞往济南上空散发传单，晓喻敌军弃暗投明，不可附逆，并在城内外低空盘旋。那时我们飞机队的学员还不会驾驶飞机，只得由日本教官驾驶，我们每机各派一人随机散发传单和绘图、观察等工作。”“当时山东的北洋军队没有飞机，经我们这一威胁，一时军心大变，听说山东督军靳云鹏还因此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后以张怀芝为山东督军。”飞机队第一队的胡汉贤记载。

“5月中旬，我与刘季谋奉命飞往济南，轰炸山东将军府，投掷炸弹，声震全城，将军张怀芝仓皇失措。”另外一当事者马超俊记道。

两位当事者的记忆有不少错误。史料载，飞机队7月4日到潍，而靳云鹏早在5月30日就被袁调任北京将军府将军。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军事行动6月10日即告停止。接替靳云鹏的山东督军张怀芝，不断派兵袭扰，居正7月12日致电孙中山文称，“五师驻潍致扰秩序难复”，“临朐、安丘、临淄三县至今未还”。7月31日，居正赴京与北京政府商定改编东北军。蒋介石日记记载，8月4日飞机队试验滑走；夏重民8月8日给孙中山的电报中说：“飞机抵此一月，以飞机库未竣工，故久未飞行。今已竣工数日，已于本月六日七日飞行两次。”由此分析，飞机队首次军事行动，应该是在8月7日以后。

北洋军第五师5月25日从潍县城撤出后，屡屡袭击侵占东北军驻扎地区。义勇团飞机队试飞成功之后，开始对不断东侵的北洋军进行威慑性飞行。飞机队常常在第五师占据地区做低空飞行，并散发传单，使他们军心震动。一次在进行侦查飞行时，发现了第五师的一个骑兵队，飞行员便拉低俯冲过去，第五师骑兵吓得纷纷落马，仓惶逃进高粱地，马匹惊得四处乱窜。当时没有炸弹，飞机队装上了一些盛装“三炮台”香烟的空铁罐，裹上炸药，制成土炸弹，从空中向北洋军投掷。尽管土炸弹杀伤力不大，但这种轰炸引起了北洋军的极度恐慌，从而为东北军就改编事宜与北洋政府的谈判增添了筹码。驻扎潍县的飞机队，应当是江北地区最早参加军事行动的中国航空队。

最终，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接受北洋政府改编。1916年9月21日，东北军代表与北洋政府代表在潍县举行签字仪式。当北洋政府代表进入潍县时，华侨义勇团飞机队三架飞机向低空俯冲飞行，与列兵整齐的东北军步兵队伍相配合，借以显示东北军的实力。

这年10月，东北军解散，大部编入北洋军。北洋政府拟将飞机队全部设备及人员调往北京，改为中华民国飞机学校。孙中山指示华侨义勇团团长夏重民，义勇团同志全体返上海办实业，飞机三架寄存青岛，候用使用。不久，包括30多名飞机队队员在内的华侨义勇团人员赶往上海，坂本寿一等日本人回国，存放青岛的飞机也被运回日本。1918年2月，曾任华侨义勇团飞机队管理主任的胡汉贤，再受孙中山指派，赴加拿大联络华侨创办中华革命党飞机学校。

■ 山海经

六字刀

□ 孙又新

临沂博物馆藏有一批临沂出土的刀币，计1536枚完整，残断的265枚，皆青铜质，表面多呈灰绿色，部分刀币品相清晰，清理后洁净光亮，像是未曾流通过的货币。这批刀币包括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六字刀，其数量之大，品类之全，世所罕见。迄今为止，包括齐国故地在内的所有同一时期古城遗址遗存中，没有任何地方能与之相提并论，其中，六字刀尤为珍贵。

刀币，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燕、赵等国，由生产工具的刀演变而成。齐刀，由齐国铸造，主要流通在齐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半岛地区。齐刀以厚大精美而著称，刀的末端有圆环，面、背有文字或纹饰。齐刀分为“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和“六字刀”，目前已经发现并著录的齐刀有“齐法化”、“齐之法化”、“安阳之法化”、“节墨之法化”、“肇邦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等数种。齐建(造)邦长法化就是六字刀，铸于春秋末年，为田氏代姜齐受封为齐侯时所铸的开国纪念币，此刀形态优雅，铸工精良，存世稀少，为历代藏家所重。

据专家介绍，这批藏币中的安阳之法化，看外形四刃弧背，刀形俊瘦，刀身边缘隆起，弧部边缘断止在刀身与柄之间，背面上端有三道横凸纹，刀柄面、背均有二道纵凸纹，背三横凸纹与铭文之间有币纹；齐之法化，刀首尖锐，四刃弧背，刀柄瘦长，刀身边缘隆起，中断在刀柄相接处。背面上端有三道横凸纹，刀柄面、背均有二道纵凸纹，背三道横凸纹与铭文之间有币纹。有的制作粗率，有的模铸后未加修整，有的模铸变形，刀身或柄有砂眼。这批刀币的面文，有的书法苍劲挺拔，洒脱飘逸，有的构字清秀清新，文采斑斓。各型面文之“齐”字变化不大。齐刀币的字体有大小疏密之分，有的结构紧凑，纤细刚劲；有的笔画松散，疏朗飘逸，有的或增减笔画；均因铸造时地不同而异。

各类刀币面文的第一字或前两个字，都是国名或者地名，例如齐之法化(习称四字刀)、齐法化(习称三字刀)，其第一个字“齐”字，就是齐国的名称。经分析，这批刀币为战国中晚期。从出土地来看，刀币出土地点背面紧靠着小城后遗址，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大汶口文化遗物，东南距即丘城遗址约0.5公里。

据《北周地理志》记载：“即丘，今山东临沂县西二十里。”通过调查，即丘城址位于临沂市西二十里，现城内有古城村。据报告之前有村民在城内曾捡到过“即丘王”的金币。根据大量的实物资料，证明即丘城一带历史悠久，自史前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发展延续至春秋战国已初具规模，到汉代时已是相当繁荣。现在古城周围还存有数座封土较高的古墓，均为汉墓。这批刀币的出土，充分说明齐国的经济在这里有重要影响。

齐国是最早铸行刀币的国家，春秋早期已开始铸刀币。当时其手工业、纺织业、渔业较为发达，是我国最早开始铸铜的地区之一。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齐国以刀币为主币，同时还流通使用过贝币和盐化圆钱。临沂古代文化有着高度的发展，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在全市境内，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临沂的沂、沭、河等诸水系和江淮相通，水上交通极为方便，这一带当时是齐、鲁、楚经济贸易的交汇地区。近些年来临沂地区货币出土数量多，出土点分布密集，充分说明这一带货币流通量大。由于货币币值稳定，使得刀币和粮食一样，都是储蓄财富的手段之一，这也反映出齐并天下，率先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后一度成为最繁荣富庶的国家。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群贤毕至

民国时期的高唐“名校生”

□ 侯立中 朱桂林



张静愚



张守常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学英国，公费入利物浦大学工学院。归国后投身国民革命，加入黄埔军校，任校长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先后参加国民革命时期的东征、北伐战争，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长、国民政府北伐军航空部队司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署中将署长、国民政府财政部全国税务署署长。他1948年任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与张治中过住甚密。1950年去台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中原大学董事长等职。1984年病故。张静愚和夫人陈秀德一生俭朴，痴心教育事业，先后在重庆、苏州、台湾等地办学多处，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子女受父母影响，他们虽身在世界各地，但铭记父母的教诲，关

注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2000年8月14日，张静愚的子女——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国际著名生态学家张新时教授，台湾中原大学原校长张方正博士，旅居美国的张建君女士及其家人荣归故里，他们遵照父母的意愿，从遗产中捐出20万元人民币，以父母名义在高唐县第二中学设立“静秀奖学金”，以资助德才兼备的二中学子顺利完成学业进入高校深造。值得一提的是，张家子弟离开高唐时，还特意捧了一袋高唐黄土带给亲人，以做留念。

高唐中学校长王国耀

第二位考入北大的是王国耀(字一华，以字行世)。1912年6月生于尹集大王庄一个书香人家，1928年毕业于高唐中学(初中)，1931年毕业于山东省立高级中学，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日寇侵占高唐县城，高唐中学不得不迁至城南坟台村(今姜店镇)东头路北一座古庙里续办，师生们大多住在一间民房里。当时，这里还是抗日斗争的热土，青年王国耀不避艰险在这一带挑起校长的重担。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给了青年王国耀重要影响。高唐党组织的创始人金谷兰在1928年春在临清金郝庄惨遭敌伪残害，此时高唐党组织正处于低潮，共产党人韩宁夫奉党组织之命从东北来到这里，以

做教员为掩护，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做了大量工作，重建党组织，这与时任校长王国耀的帮助和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唐中学在济南续办，1948年，王国耀二任高唐中学校长，兼教英汉两种语言文字，教员中有一位叫马骥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成员教英语，上课时常常宣传反内战、反饥饿等不满当局的言论，很受同学们欢迎。王国耀也很重用他，给了他较高的工资待遇。那几年，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饥寒交迫，极为艰难。王国耀对当局十分不满，他借讲授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课之机，以个人感受倾情讲授杜甫的穷困潦倒，引起同学们的共鸣。这时，他的家庭也已残破不堪，原配夫人和长女先后离世。解放后，他被分配到历城中学当教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的家庭生活困难，上级给予多方照顾，安排其妻到就近的小学教书。当年济南出版的有关报刊对此有过报道。但他终因体弱多病而去世，终年只有五十多岁。

历史学家张守常

尹集大户人家对教育十分重视，当地还有一位考入北大学有所成的是张守常先生，他是当今中国近代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张守常1922年出生于尹集北刘湊庄(今尹集镇后刘庄)，少时聪颖

好学，多才多艺，初中阶段就读于济南(济南中学)、高唐(高唐一中前13级)两地。1941年去北京读高中，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后转入历史系。1948年毕业后在北大图书馆专修学习二年。北大六年熏陶为张守常日后的学术成就和他的民主、民族革命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1948年他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人民教育工作者联盟”，这期间，他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启发诱导青年人认清形势，明辨是非，走向革命。1956年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守常在济南中学(今济南一中)念初中时就发表了散文《秋天到来的时候》，以后不时有话剧、小说(连载)、诗歌、论文等屡见报刊。北平沦陷后，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做汉奸事，不在敌伪报刊上发表文章。北平解放前夕，他又多以文艺(如戏剧、诗歌、散文等)形式抨击时弊，揭露黑暗腐败。这些文章多收到2000年出版的《拂晓集》中。1953年起即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他最早的专著是《中国近代史纲要》，最大部头的书是《太平天国史资料选编》，包括少数与他人的合著，他的文集约有15部之多，其他散论不下百篇。总计已发表的文字约在千万言以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独到成果，对太平天国北伐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他每有著作出版面世，常常赠予家乡人。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回家乡作报告、办书画展，他的事迹县人颇多。除了在北师大教课带研究生外，他还常常应邀赴外地讲学、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某次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在山东召开，张守常教授是这个学会的理事，于是他带了县里的一位同志参加，目的就是让这位同志亲聆专家学者教诲，开眼界、长见识、增才干，可见他为家乡人才的培养真是煞费苦心。